

人类曾经伫立,现在也还在这里

——关于流行病文学的阅读和思考

编译/高曜

圣塞巴斯蒂安是基督教艺术中的圣徒形象之一。他原本是古罗马禁卫军成员,在3世纪时因信仰基督教而被戴克里先皇帝下令乱箭射死。古罗马曾多次发生大瘟疫,传说第四次大瘟疫中,人们敬捧着圣塞巴斯蒂安的圣骨游行并虔心忏悔,大瘟疫因此得以遏制。因此,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时,圣塞巴斯蒂安被尊为“瘟疫主保”。他在文艺作品中常被描绘成遭乱箭射穿的形象,深受黑死病之苦的人们,把疾病的随机性和圣塞巴斯蒂安身上的乱箭联系起来,因此,这位圣徒的形象和他身上的箭簇更加引人共鸣。正如约翰·凯利(John Kelly)在关于黑死病历史的著作《大死亡》(The Great Mortality: An Intimate History of the Black Death, the Most Devastating Plague of all Time)中所表达的,对许多欧洲人来说,瘟疫被视为乱箭般的惩罚。

流行病也消解了信仰的力量,约翰·哈特彻尔(John Hatcher)在《黑死病》(The Black Death: A Personal History)中写道,许多人“听天由命”,因为“命运落在何处”,就像射向圣塞巴斯蒂安的箭一样难以预测。而在医学史家罗伊·波特(Roy Porter)笔下,14世纪的黑死病不但给人们留下长久的阴影,也留下一些延续至今的文化元素。根据他在《理性时代的肉身》(Flesh in the Age of Reason: The Modern Foundations of Body and Soul)一书中的研究,今天的万圣节装饰、海盗文化中的标志等,都是一种纪念,纪念人类曾经在疫病大流行中的悲壮抗争。

15世纪瑞典教堂画家阿尔伯特斯·皮克托(Albertus Pictor)在斯德哥尔摩一处乡村教堂留下了主题为“与死神对弈”的壁画。这是导演英格玛·

伯格曼(Ingmar Bergman)1957年的电影《第七封印》(The Seventh Seal)的灵感来源。电影讲述了骑士布洛克与黑衣死神对弈,过程中回顾了他在瘟疫蔓延的欧洲大陆的经历。影片同时呈现了命运之手的操弄、人类的挣扎和幸存,更重要的是提醒我们,在命运的棋局中,人类并非时时是高手,相反,有时候面对的棋局非常糟糕。

流行病文学可谓文学中的一大传统,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记录恐慌、绝望等体验,还在于表现人类的“绝地反击”。最著名的瘟疫文学之一是薄伽丘的《十日谈》,讲述了几名意大利青年男女在佛罗伦萨郊外躲避传染病,用讲故事的方式度过十日。这些故事看似低俗,却是一种自我疗愈,青年感到命运和大自然的无常,也意识到宗教的无力,这些口无遮拦的故事意味着挣脱中世纪宗教的枷锁,而《十日谈》也成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渊源之一。

杰克·伦敦(Jack London)的小说《猩红瘟疫》(The Scarlet Plague)则表现人类面对流行病的杀伤力时仍然竭尽所能追寻文明的连续性。小说的主人公、英国教授詹姆斯·史密斯(James Smith)回忆起2013年在伦敦暴发的被称为“红死病”的出血热,这场瘟疫迅猛发展,消灭了全世界绝大多数人口。大约60年后,史密斯回忆起红死病以前曾有过的复杂的人类文明,一时难以分清那是真实的过往还是脑海里的幻觉。伦敦写道:转瞬即逝的人类系统像泡沫般消失,人类在地球上的辛勤劳动简直就是泡沫。

《猩红瘟疫》故事直到遥远的2073年才结束,同一年,玛丽·雪莱(Mary Shelley)的流行病故事《最后之人》(The Last Man)徐徐铺开。小说的主角莱昂内尔·韦尔尼(Lionel Verney)

在2073年全球流行病中幸存,成为了“最后的人类”。他独自留在荒凉的世界,只有荷马和莎士比亚的幽灵与之相伴,只能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侃侃而谈。但文学的意义正树立于此:微生物和细菌无法抹去人类的存在,人类的声音会始终回响在大地上。

关于艾滋病危机的经典文本之一是托尼·库什纳(Tony Kushner)的戏剧剧本《美国天使》(Angels in America: A Gay Fantasia on National Themes)。《美国天使》糅合了20世纪初犹太移民问题、麦卡锡主义、同志社区对抗艾滋病的努力等丰富主题。剧本的洞察力体现在,认识到了美国社会中流行病与政治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,治疗的权利和医疗资源的分配都无法躲开政治博弈。库什纳写道:“美国没有神,没有鬼怪,没有精神上的过去,只有政治,而欺骗者却在不可避免的政治斗争中回旋。”流行病的悲剧色彩在这部作品中格外浓重——处于生命顶峰的年轻人可以被自己的肉体谋杀。

相似的关怀在兰迪·希尔茨(Randy Shilts)的艾滋病经典著作《世纪的哭泣》中也有。希尔茨的写作与丹尼尔·笛福(Daniel Defoe)在《瘟疫年纪事》中的手法相似,以科学理性的叙述传递流行病的杀伤力。里根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曾公开嘲笑艾滋病为“同性恋瘟疫”。《世纪的哭泣》中最令人痛心的结论之一恰恰是:艾滋病流行中不可逆转的悲剧在于,美国关注到这种传染病时,为时已晚。希尔茨在写作期间接受了艾滋病检测,他为了保证写作的客观性,直到全书完成以后才让医生告知其检测结果——不幸为阳性。他于1994年死于艾滋病并发症。无论如何,《美国天使》《世界的哭泣》等作品都清

醒客观地记录了这种流行病最初几年的发展态势,尤其是在旧金山同性恋社区的爆发。

关于流行病的小说还可提到迈克尔·克莱顿(Michael Crichton)有关虚构病毒的《天外细菌》(The Andromeda Strain)、罗宾·库克(Robin Cook)关于加州埃博拉疫情的《暴发》(Outbreak),以及斯蒂芬·金(Stephen King)的《末日逼近》(The Stand)。尽管都是虚构作品,但其中对于疾病的反思仍具有严肃的意义。《末日逼近》的故事中,因为一次差错,致命病毒流出并迅速扩散,几乎导致美国的崩溃。金的写作有着中世纪传统,通过喉咙痒、流鼻涕以及咳嗽等症状的不断描述,呈现的是对于疾病和人类关系的深入思考——生命就像一个轮子,无人可以稳稳地久立其上。

罗伯特·凯克曼(Robert Kirkman)的小说《行尸走肉》(The Walking Dead)、乔治·罗梅罗(George Romero)的经典僵尸小说等,同样受到读者喜爱。但是,这几部小说无疑充满了美国式的幻想,即可以看似很爽地任意攻击他国。流行病文学应该带来的启发显然不止这些。我们要深思的,除了人类的抗争本身,还应该包括生命的偶然性,以及人类文明的脆弱。后者正是桑塔格在《疾病的隐喻》中的思考。病毒就像商品一样,可以在全球化的世界中自由移动,吊诡的是,恰恰是病毒的自由流动影响了全球供应链的稳定和商品的流动。

流行病文学也提醒人类“疾病始终与我们共存”这个亘古命题。加缪的《瘟疫》描绘了疾病肆虐的阿尔及利亚奥兰,作品极力呈现病因的难以捉摸、感染的任意性以及得病的随机性。由此,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现实:尽管人类看似自



《美国天使》

然的主宰,但并非这个世界的主人。中世纪的艺术和文学充满宿命感,比如,鼠疫蔓延时,没人知道谁会第一个罹难,谁会是最后一个倒霉蛋。当黑死病席卷欧洲时,无人能置身事外,才华横溢的雕塑家、诗人、哲学家,腰缠万贯的银行家,病毒对他们的攻击,不分对象,不问贫富。当代小说也试图呈现类似的视野:在一声咳嗽之后,财富、权力和声望,全部微不足道。流行病文学最终的立意在于:提醒我们世界并不只属于人类,但在这个时而被流行病统治的世界上,人类曾经伫立,现在,也还在这里。

(本文编译自 themillions, 作者为洛杉矶书评编辑 Simon)

策划:

文汇报理评部

执行编辑:

任思蕴 rsy@whb.cn

封面编辑:

陈韶旭 csx@whb.cn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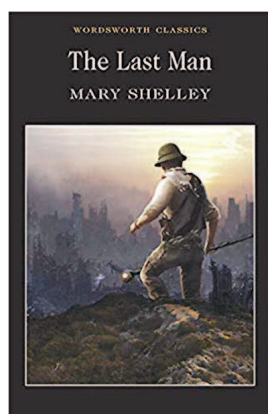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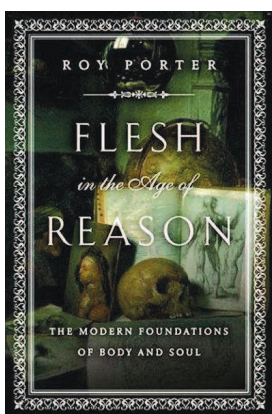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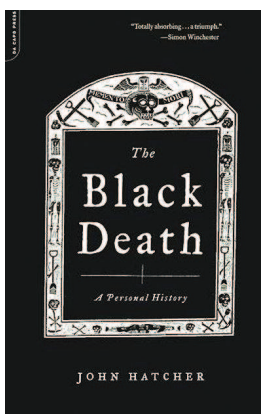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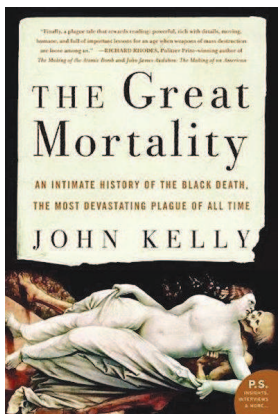
封面图片:

“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”,伊萨克·列维坦(俄)《意大利的春天》(局部)

敬告读者

今日八版

扫一扫微信公众号二维码, 关注文匯學人



自左向右:

《大死亡》

《黑死病》

《理性时代的肉身》

《最后之人》